

裡面。

但是，快到年底時局越來越吃緊了。差會和神學院感到對我不起，一定要趁戰爭沒有蔓延到上海前，把我送出國去。於是，他們主動爲我申請出國。這對我有很大的好處，原先出國是由滬江的宣教士出面募款，而現在卻是正式給獎學金，使我拿到第一個B. D. (道學士)學位。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五日，在上海淪陷以前三個月我出國深造了。

美南浸會神學院

美南浸會神學院是美南浸會最老牌，也是學術最高的一個神學院，我坐美國運輸艦改裝的載客船，再搭火車到達學校已經三月初了，只能旁聽幾課，熟悉我聽課和會話的能力。他們也正式鑑定我的學歷，一九四九年九月開始，以二年級開始就讀。

第一學年非常吃力，尤其希臘文的一年級課程是在台灣讀的，由第二年希臘文開始，簡直不能招架。但是我沒有灰心，繼續K書。

那段數火柴的日子

雖然我已經有了發憤的決心，但是要實現這決心是難而又難。在所有的功課中最難的是希臘文，偏偏那學校又自認希臘文是它的傑作。英文中有一句諺語，描寫某一功課的難，爲「這對我好像希臘文一樣！」由此，可見希臘文是最難的功課了。我的「初級希臘文」是在上海讀的，老師的要求不太嚴格，一讀到「中級希臘文」就要了我的命。

第一堂課上完以後，老師告訴我們下一堂課有五分鐘的「隨堂考試」。我回到宿舍就拚命預備，我一共花了八小時來預備五分鐘的考試。結果，我得了四十分。算一算一個小時拿五分。下課以後，我拿了考卷，進入禮堂，那裡掛了學校中以前的名教授的圖像，那位鼎鼎大名，使這個學校馳名全世界的A. T. 羅勃生教授的油畫也在那裡。我望著他的畫像，眼淚不禁奪眶而出，甚至泣不成聲。我不住地在想，我遠渡重洋，難道就來拿這樣的破分數？他寫得出這麼好的教科書，我怎麼讀都讀不懂呢？這門功課真是高深莫測。但是，我在上帝面前決定：我在哪裡摔下去，我一定要從哪裡

爬起來。

從那時起，我展開了那段數火柴的日子。我把十根火柴放在我的右邊，每讀一次希臘文的生字，就搬一根火柴到左邊，十根都到了左邊，再一根根搬回右邊。我經常開夜車到一、二點鐘，然後六點鐘再起來複習。讀語文就是那麼麻煩，在你還沒有入門以前，它是那樣地難記得，又那樣地容易忘記。儘管第一天晚上把火柴搬了那麼多次的家，第二天又忘得一乾二淨，只好再從頭讀起。那一段時候，我在睡夢中也在背書；我在飯廳中等吃飯，排隊要等半小時到四十五分鐘，我拿了一小疊卡片在背；我等公車的時候，也在背（我雖然是數火柴出身，我現在不建議別人數火柴）。

那學校一學年分三季。第一季的成績是七十分，剛及格；第二季的成績是八十五分。教授曾在班上大大誇獎一番，稱讚我是他教過學生中進步最快的一個。第三季考試要包括整個學年，內容太多，我只考了七十八分。

我的「中級希臘文」及格是沒有問題，但是離開修「高級希臘文」卻有一段距離。「中級希臘文」是必修課，有六班，每班五十人。「高級希臘文」是選修，只給三百人中的前五十名修讀。這五十名是準備進研究院進修希臘文新約碩士班和博士班

的。可是，因為我這一年的努力，我一定要爭取。我去見教我的教授，他表示這是學校的優良傳統，他愛莫能助；我去見系主任，他就是高級希臘文的教授，也是新約研究所的所長，他只是搖頭。他說：「我只收五十名。我收了你，一定要當掉一個，而那位第五十一名的成績比你好多了。」

我再去見本科教授，我問他：「你是不是說過，我是你所教過學生進步最快的一個？」

他說：「我說過。」

我對他說：「你為了一個進步最快的學生，你要在系主任面前求情，破格錄取我。」他帶我去見系主任，他不但說他在班上曾經說過的話，他告訴系主任我的分數是怎樣得來的，他為我力爭。最後，系主任答應我試讀一季，成績不好就自動退課，成了一班中的第五十一個。我一直覺得這班列車只有五十個座位，我是買站票的旅客。

註冊以後，有些科目在沒有上第一堂前，助教就把第一堂所要準備的作業寫在黑板上。大部分學生都忽略這一點，我既然是第五十一名，戰戰兢兢地不但看了告示，也預備了功課。這雖然是大學畢業以後的第三年，教導的方法還是最基本的，教授在

上面叫學生的名字，要學生把準備的課程一一作答。那學校希臘文課的傳統，教授從不給學生面子，當面責備，站在那裡，再叫第二個回答。那一天是第一堂課，所以大家沒有準備，一連叫了七、八個名字，都回答不出來，教授半開玩笑地說：「我的第五十一名，你倒說說看。」我回答得很滿意，他對我看了足足五秒鐘，他說：「謝謝你。」又對那些罰站的說：「坐下吧！」大家一坐下來，那群美國天真孩子都鼓起掌來。他爲了對其他沒有擠上列車的二百五十位有個交代，他開始解釋，爲什麼叫我「五十一」，和收我在班上試讀的經過。

從那一天起，只要接連有幾個同學回答不出，教授就叫我的名字。別的同学是輪流回答的，而我幾乎每堂都被叫，所以我非每一堂都準備功課不成。就這樣，我一個學季中讀完了那本有一千四百多頁的希臘文文法。那一段時候雖然已經不必再搬火柴，但是上希臘文的前夕我只睡了四小時覺，每一堂課以六至八小時來準備。

這一學季終於熬到了季考，我認爲大概不至於被淘汰了，因爲我至少在課堂上有問必答，而且最後的筆試也還不錯。不過，那一季考完以後，分數還沒有發表以前的時期，我總覺得好些研究院的學長都對我怪怪的，而且講話也很神秘。後來，我才知道，

因爲他們已經知道了我的分數。

最後，揭曉的時刻終於來臨了。系主任把所有其他的考卷都發了以後，他開始問

我：「我親愛的五十一號，你考得怎麼樣？」

我說：「不知道。」

他說：「這對你很重要，因爲你答應我，第一學季讀得不理想要自動退課的。你要遵守你的諾言，我也要對真正的第五十一名有個交代。」

我說：「我知道。」

他又轉問班上的同學：「你們看周及格了沒有？」

那群天真的美國孩子大叫：「Yeah」（及格了。）

他說：「不但及格了，而且還是本班的第一名，他拿了九十九分。原先助教要給他一百分，因爲他希臘文部分都答對了，可惜拼錯了一個英文字。一百分是給全對的，所以我扣了他一分。」

他叫我去拿考卷，跟我握手，他說：「你是本班的正式生了，我不再叫你五十一了。」

苦盡甘來

這一季對我讀書生涯的影響很大，我開始對我自己有信心，第二季我拿了一百分。畢業班的第二季，如果學生要考研究院，而成績優良的，可以免考第三季季考，用前二季的平均分數，作第三季的成績。

B. D.畢業了，學校先請我當教書助教(teaching fellow)，可以改課卷，教授缺席的時候，要代課。我還是那所學校的第一個東方fellow呢！緊接著我考進研究院博士班，因為成績優異跳過碩士班，直攻博士。美南浸信會國外傳道部原先只供給我B. D.的獎學金，但因為學校先肯定了我，認為我將來可成為神學教育的人才，而再度支持我，使我沒有經濟之憂。我不必去找錢，可以平平穩穩攻讀博士學位。

我非常幸運，那幾年美南神學院剛好改制，以簇新的方式教學，從跟人做徒弟的方式改為讀書的方式，使我自己有閱讀的能力，不必跟隨某一位老師。我讀的是新約，共有五方面：新約希臘文、新約文獻、新約考古學、新約神學，和新約歷史。每天就讀書好了，沒有其他的顧慮。在我讀第一個學位的時候，希伯來文比希臘文還要好，

前十年幾乎是找不到我這樣成績的人。在第一年讀希伯來文的時候，每次考試我有時間做三份卷子。第一份寫得非常工整，第二份非常快再默寫一遍，第三次是把兩份卷子互相對照，如有不同的地方，再考慮到底哪一份是正確的答案。希伯來文十分繁瑣，很容易少掉一點或一鈎，我這麼做擔保不會遺漏任何很小的缺失。老師看到我那麼許多考試的紙，還以為我作弊呢！第二次他一直站在我邊上，直等到看見我第三遍自我校對，才對我笑一笑，離開了。但是我不能主修希伯來文，因為它不太完整，我深怕它有一天有大的進步，我會跟不上。假如我知道出國那麼容易，我大概會主修希伯來文的。

兩年以後，我開始「預備考試」，「預備」寫論文的考試。我在兩個月以前把應考的範圍，和溫習的書準備好，幸好我把所有的書幾乎買齊了，又每天到圖書館借了很多書回來。兩個月以前我搬到男生宿舍，省得我驚吵了家人，每天平均睡四小時。在考試前的一、二個月，我每晚可讀四、五本書。我已把一、二百本「主要參考書」讀完，那些時候讀「次要參考書」。等到考前二個禮拜，我每晚睡二小時，分四次睡，每次半小時，如果不醒就去沖澡，吃東西、讀書。

筆試了，一共五門功課，考五個上午，每門四小時。這是十分緊張的時刻。我讀書沒有筆記，不背一、二、三、四，或A、B、C、D。每一道題目我先想，然後即刻自己做一套大綱出來，把這題目的主要學說、學派都包含在裡面，再加我自己的意見。我幾乎用半小時的時間思考，最後才正式答題，因此，我的回答相當「獨創」的。那個星期的考試，不只是考學識，也是在考體力。跟我一起參與考試的一位女同學，她第一場考完，她的丈夫接她回家，午飯已煮好，等她享受。忽然，她說：「天怎麼那樣黑？」

先生說：「明明是大太陽。」

「你在哪裡？」她連先生在哪裡也看不到了。

他們即刻去看醫生，醫生說是緊張過度，體力透支。假如要活命的話，應該即刻放棄考試，快快休息。她到鄉下老家去休養一段時間，過了兩個月，身體復原了，但是書卻不能讀了。她跟我一樣，跳碩士，直攻博士；現在二、三年時間白費，碩士也沒有，但是性命、健康、眼睛當然比學位更重要。

考完以後兩個星期，收到研究院正式通知，可以寫論文了。論文的題目也費了很

長時間的思考，我要的題目是包含很多方面，因為我已經打算回國教書，國內神學院小，找不到許多專家，最好題目可以包括希臘文、希伯來文、舊約、新約，和新舊約間的四百年的歷史與文獻。在許多的題目中，我挑了當年剛發現的「死海卷」，它是在死海附近發現的一些書卷，又新穎，又能滿足我的需要，上面所列的條件完全符合。

我一方面寫論文，一方面還有時間到其他神學院去聽課，梅笙(T. W. Manson)剛好到美國來，在紐約協合神學院教暑期學校。他是毫無問題，全世界新約數一數二的專家，我去報名上課。這一課程只有三星期，上課的學生大部分已經是在各神學院教書的副教授或講師，濟濟一堂好不熱鬧。但是他們大部分是「玩票」性質，帶了太來，到紐約旅遊、度假，兼讀書。梅笙教授給了一個題目，我從拿到題目以後，就開始寫論文。我讀了他許多作品，我有些知道他寫作的方法。我學他的寫作方式寫了一篇五十幾頁的論文，雖然短，但是看得出費了工夫。在最後一天，他特別宣布這是全班最好的一個學生，他說：「毫無問題是全班最好的一篇傑作，在這麼短的時間能寫出那麼精細的論文，我會等待更好的作品。」這真的使我臉紅，但是他的肯定對我一生做學問的自信有很大的幫助，他不是因為我是東方人才說這句話，因為我的確是

寫了全班最好的一篇論文。他當然不知道，我在這三個禮拜中，整天在圖書館，每晚只睡三、四小時。順便我要提一提的是，這個學校就是被許多教會最景仰的宋尚節牧師批評得最嚴厲的一個學院，而我卻得到最大的幫助，不但是學識的，也是靈性的。我覺得累的時候，就到禱告室去禱告，吃一點東西，喝一杯水，再讀書。每天都好幾次到那裡去靈修。老懷恩堂的樂民館禱告室，完全仿照協合神學院的禱告室。這三個禮拜也是我在美求學時期的靈性最高峰。

一年後，我的論文寫完，是屬於B.D以後三年寫完論文最快中的一個。口試也非常順利。當時，我們可以選擇拿神學博士還是哲學博士，因為我們讀書的方式完全是照哲學博士的方式。通常我們都選神學博士，因為以最快的候選人來說，神學博士要大學以後六年，而哲學博士是三年。神學博士包含了三年的神學基本訓練，如果是專修聖經的，還需要四種文字，那就是希伯來文、希臘文、拉丁文、德文或法文，而哲學博士不一定要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後來，到了國內才知道，神學博士不被尊重，所以我的母校對某一批畢業生（剛好是學課最緊的時期），可以換學位的時候，我就去換了一個哲學博士，回想起來，十分窩囊。現在我向教育部力爭，它已能接受合格學校

的神學博士(Th. D.)。

我在一九五四年五月中旬畢業，八月中旬就回台灣來工作了。

沒有當美國公民

我在美國求學的過程中有三次當美國公民的機會，那三次都是順理成章，毋須強求的，我都婉拒了。

第一次是大陸剛淪陷不久，在美的中國留學生都很苦悶，在放假的時候，不是參加夏令會（或者春、冬令會），就是參加同學會。在這些會中大家能夠獲得一些祖國的消息，同學們的相聚也能聊解思鄉的情感。我雖也屬於這一批留學生中的一員，但因爲功課太忙，始終沒有參加過這一類的聚會。

後來有一群留學生回去以後對美國反宣傳，於美國頗爲不利。於是，國務院下逐客令，把所有參加過上面兩種會議的學生都命令離境(deportation)。我沒有參加過，得以倖免。很多留學生由學校的外籍學生輔導擔保，再由本州參議員加保而留了下來。那時想回家的學生很多，跟親共反美毫無關聯，因此有些留學生就回國了。這數百人

回去以後，對美國的宣傳更糟，非常不利。所以美國國會中通過一個法案，把所有在中國大陸淪陷以前的留學生當作「無家可歸」(displaced person)的人，一律成為美國公民。我也是有家歸不得的人，但是我考慮再三，我沒有接受歸化。

第二次是韓戰的時候，美韓交戰不久以後，有兩個美國人來訪，他們是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會友，邀我去他們那裡演講，指定要用「北方中國話」講。我答應以後，他又跟我討論，我對北方中國話的「能說度」到底有多少。我告訴他，「北方中國話」是我們的國語，我這些年來就是用國語工作的。到這時候，他們大大放心了；於是開門見山地說：

「你不必來演講了，我們也聽不懂你所講的。我們在韓國戰場需要大批翻譯官。我們可以推薦你，你明天上午到郵政總局（他們郵政總局的樓上，是中央聯邦政府的辦公大樓）報到，宣誓成為美國公民，下午就接受上尉官階，飛舊金山報到，到韓國戰場去當翻譯官。」

我告訴他，我要考慮。最主要的是我要參加博士班的資格考試，我離開了學校，再回來，功課都忘記了，大概再也考不上了。我就把我的猶豫告訴他。

他說：「除非你不反共，不然你應該跟我們一起去向中共作戰，更何況你能成為美國公民，又能成為美國的正式軍官。等你回來，退伍以後可以用政府供給的錢(G.I. Bill——Government Issue Bill——非常優厚的待遇)來讀書。」

當時我只想完成學業而婉拒了。第二天，還發生了很大的問題，美國政府來調查，我是否親共？虧得我的外籍學生輔導主任幫我解釋，才算解決了問題。

第三次，我畢業以前，有一個神學院、兩個大學邀我教書。假如我接受的話，這些學校會為我申請公民，居留下來。宗教人士是有最優先待遇的。我當時的問題是到底我是否要回東方，為中國人工作。我經過很長時期的禱告，我決定回東方，以中國人最多的地方，也是中國的「根本」——台灣工作。我沒有成為美國公民，能使我更死心塌地為這地方工作。

兩次進修

台灣浸信會神學院，每教六年書，第七年可以有進修。我在一九六〇年去普林斯頓神學院進修。我當年主修是新約。我回國以後，發覺不頂有用。沒有人跟我討論新

約，學校裡上課越講得深，學生越不懂，越會誤解。而碰到的人談論的問題都在宗教哲學的範疇中。我已經開始閱讀這方面的書了，我需要有一段進修的機會。

我到普林斯頓去修巴特神學(Karl Barth)，我也自修讀田立克(Paul Tillich)、Emil Brunner的書。另一位權威Reinhold Niebuhr，因為政治哲學與我不投機，所以讀他弟弟Richard Niebuhr的書。在一個學期後，我開始「遊」學，我去Richard Niebuhr處去討教宗教與文化的問題，我親自去見田立克，上了幾堂課，我到瑞士去見Brunner，可惜他已病了，可是還談了一些時候。最大的收穫是巴特。我起先不懂他說什麼，一到瑞士碰到他的弟子徒孫，更加困惑，不知所云。後來，我跟他約好了，只談了五分鐘，就忽然開朗，他的神學我好像懂了。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每週的一個晚上，他為英語學生辦一個研究班，那些學生都跟他辯。他的英文到底有限，他找不到適當表達的時候，急得他要死。

那一年，我有兩個月的時間在瑞士日內瓦附近的一個古堡閣樓上讀書，每天打開窗戶就能看到阿爾卑斯山的Mount Blanc山頂的積雪。除了吃飯以外，都在閣樓上讀「宗教哲學」和神學的書。實在熱得耐不住的時候，就穿了游泳褲到日內瓦湖裡去泡

一泡。兩個月以後，我去牛津大學，到Regent's Park學院去讀浸會的原始文件。下午到泰晤士河邊去譯書。那時窮得一天三餐都不周全，但是精神食糧好到無可比擬。

第二次再到普林斯頓神學院是爲了聖經公會要我翻譯聖經了。想當年我的希伯來文雖然成績優良，但已忘記了，需要再進修，而且我沒有讀過亞蘭文。舊約的原文大部分是希伯來文，也有極少數是亞蘭文，所以我也去修亞蘭文。爲了單一目的，收穫是很大的。

學無止境

對學術而論，人永遠不畢業。我還在努力，儘量開沒有教過的課，逼著自己讀書。至少我沒有感覺到老了，讀不進去了。雖然許多人和許多事都已到了「健忘」的階段，幸好讀的書還沒有忘記，我還在不斷學習，希望不會有一天，給人說，「他已經老朽了，不可能再學新的玩意兒了。」